



乙

欽佩的克來敦

44

譯者的序

一 巴利

蘇格蘭福法縣（Forfarshire）有一處小小的鎮市，名子叫克力穆（Kirriemuir）。雖然本鄉人叫它是百年的老鎮市，引以自豪，其實直到今日，也還不過是個凋敝的村莊。人口不過三千，離縣城還有六英里，只有一條鐵道的支綫：從那方面講，它決不是什麼重要之區。可是它的天然景物，倒有差強人意的地方，譬如，格蘭坪山（Grampian Mountains）團團圍繞，作成一個極大的酒杯，克力穆村便居於杯底，藉着偕麗

河(Gairie)的細流，傾瀉不絕。山靈水秀，必有所鍾，於是一八六〇年五月九日，舉世欽慕的巴利(James Matthew Barrie)就在此降生了。

巴利是特出的天才，少年時已有表現。我們固然無法證明他童年時的成績，但是在他那可愛的小說 Sentimental Tommy裏，也就可以想見一二了。及至進了鄧佛雷中學(Dumfries Academy)，他在校刊雜誌裏，便大露頭角，直到如今，「小丑雜誌」(The Clown)還因為巴利寫過文章，叫收賣舊籍的書賈，獲利百倍。

一個人的中學時代，或許是印象最深，愛慕最切的吧。巴利的著作之中，往往描寫童年的學校生活，親切有味，而我們讀者也不禁和他盡量的同情。在鄧佛雷中學裏，巴利第一次碰見一個大人物——「一個很大的人物」，他說，——卡萊兒(Thomas Carlyle)。那時卡萊兒正在那兒探望親友，巴利常看見他頭戴寬邊大帽，身穿長袍，提着一根粗重

的手杖，闊步開行。一個將來的大文豪，在一旁暗暗崇拜，他何曾一些兒放在意下。小小的巴利，看見卡萊兒總是脫帽致敬，殊不知他一次也不還禮。我們不能怪卡萊兒，因為他正是喪妻之後，倘恍若有所失，那裏顧得了無謂的周旋。巴利實在急了，無論如何，總得和大人物交談幾句，以便異日誇嘴。於是有一天便硬着頭皮，撞上前去問路。誰知卡萊兒提起手杖，指了指道旁的計程碑，一言不發，腳不停步的走了！

雖然碰了卡萊兒的釘子，見面而不能相識，但是巴利和史蒂芬生 (R. L. Stevenson) 的交誼，却在此時已經開始。他在「小丑」裏所寫的文章，大半是綠林豪傑和海上英雄的故事，和史氏的小說，不謀而合。一八九二年，巴利的 *The Little Minister* 和 *A Window in Thrums* 出版以後，史蒂芬生讀了，大為賞識，寫信去稱贊他：這兩位文豪雖相隔重洋，素未謀面，却憑着紙筆，彼此訂交了。這可不是運有泰否，乃是時

有早遲。他對史氏的交誼之深，敬慕之切，在他逗着他母親看史氏的著作那件事上，我們可以斷定。讀過 Margaret Ogilvy 的人，一定都能想見他母子間的樂趣，朋友間的傾慕的。

巴利是不大做詩的，（除John Nicol 以及三數零星小品），但是史蒂芬生死了（一八九四）之後，他寫過一首十七節的長詩，題名「蘇格蘭的悲哀」（Scotland's Lament），以誌哀悼。這首詩規律嚴謹，一往情深，可稱詩中上品。可惜巴利不愛多寫，未免是我們的一種損失。

中學的快樂時期過去了，巴利升學了。但是，在愛丁堡大學的日子便不及在鄧佛雷好過，因為從前有他的哥哥在那一帶當督學，多少有點照應，如今是舉目無親，鎮日相見的是那所謂之教授的七個板着面孔的狠人。而且，巴利家道素來清貧，進了闊綽的大學，窮小子更顯得窮，只好安分守己，更加勉勵。雖然是三個窮小子共用一張床，輪班睡覺，

可是巴利守着青燈黃卷，還是不改其樂，他終於成爲一個偉大的人物，也未嘗不是家貧之功吧。然而，他對這個時期的回憶，決不是辛酸；我們的作者依然是雍容大雅，莊諧雜出的來紀念它。關於此點，希望讀者細向 *An Edinburgh Eleven* 去尋思，姑不多說。

那時候的父母，沒有一個不希望有做牧師的兒子的，正如我們中國的父母沒有一個不希望有做官的兒子一樣。巴利以文學爲志願，而他母親居然與以充分的同情，叫他能夠達到這個志願，足見 *Margaret Ogilvy* 確是個可愛的人。所以他在大學得了碩士學位之後，便回到克力穆村，開始度他的文字生涯。

不久巴利忽然發生了爭名者於朝的念頭；要賣文章，得到倫敦去賣。他母親深知文人的厄運，不敢叫兒子上這種勢利的地方去。他千方百計的騙她，並且畫了一張地圖給她看，和她同在紙上遊覽英京名勝。

這張根據想像的地圖，便是潘彼得書 Kensington Gardens地圖的前因。只可惜它不存在了。他可說得天花亂墜，怎樣著作宏富，傾倒一時；怎樣大大的得意，同丁尼生 (Alfred Tennyson) 做熟朋友；只樂得他母親無話可說。

時機到了，他姊姊有一天偶然在報上看見一則招聘編輯的廣告，月薪約二十一鎊。這個位置，在克力穆的鄉下人看來，未免眼紅。而巴利居然說便成，也不能不算是福運亨通吧。於是一八八三年二月，巴利遂進了 Nottingham Journal 的編輯部。

他的賣字生活，都在 When a Man's Single 裏描寫了。做社評，辦副刊的朋友們，都有這種經驗，大概總不能否認這是多少於理想的文學無益的吧，雖然做編輯，辦報紙也有他的特殊趣味。但是，抓題目不到的時候，做一兩則劇評，一樣可以塞責不是？所以巴利也爲了搜集材

料，時常去看戲，——居然和戲劇發生重大關係，幾乎是他自己初料所不及的。

不過巴利之和戲劇發生因緣，推本溯源，還在他未離故鄉以前。在 *Auld Licht Idylls* 裏，他描寫一個集場上的戲班，極其有聲有色。他所注意的不但是台上的角色；台下的觀眾，前台的經營，後台門的把守，劇場的各方面，沒有一樣不是巴利所注意的。那末，巴利之所以爲巴利，我們又何難了解呢？

※

※

※

※

※

還沒滿二十五歲，巴利終於達到了他爭名於倫敦的目的。這個志願的成功，不能不感謝 *St. James's Gazette* 報館主筆葛林屋 (*Frederick Greenwood*)。葛氏登載巴利的文章，大加賞識，並且給了他移居京都的鼓勵。及至他與高采烈的到了倫敦以後，殊不知依然百不如意，盡逢

坎珂。爲了維持生活，筆不停揮的寫，報紙上的文章，故事，小說，隨筆，打油詩，沒有一樣不曾試到。他那時最大的成功，是兩篇政評和諷刺，因爲會被人認爲言之有物。每次他在報上投稿，此中人都得對他警告：「別用方言——民衆不讀方言的。」

巴利住在佛黎街 (Fleet Street) 的時期，雖然是窮極無聊，但是得了葛林屋們一般新聞界的先進鼓吹，他也漸漸的稍露頭角了。就中他最難忘記的是「大英周刊」(British Weekly) 主筆尼可爾 (Rev. W. Robertson Nicoll)。When a Man's Single, An Edinburgh Eleven，以及 Auld Licht Idylls 的一部份，便是在他手上刊登的，雖然巴利化名「Gavin Ogilvy」。

一八八八年他的 Better Dead 出版。除了是他頭一部單本的書之外，這是件極不重要的作品——他自己常說這本書「最好是死了罷」。

這是個短篇，總共只一萬六千字，紙裝本賣一先令。作者本人雖不滿意，銷路却佳，並且有一個批評家說它是王爾德跟蕭伯納合著的。

不久他在「大英周刊」上登過的三種小說，以及 *A Window in Thrums* 也陸續出版了。出版以後，史蒂芬生，亨利·傑姆斯，美力的斯，還有許多名人，都非常的佩服他，鼓勵他。一八八八年，真是巴利氣轉鴻鈞的年份，我們應當特別恭賀他。

The Little Minister, *Two of Them*, *A Superfluous Man*, *A Tillyloss Scandal*, *Auld Licht Idylls*, *My Lady Nicotine* 等作，繼續在雜誌上發表之後，巴利在文壇上的地位，遂愈加穩固。

在 *My Lady Nicotine* 及 *The Little Minister* 單行本出版之間，最值得叫我們注意的是他又走了一個新的方向——巴利開始寫劇本了。最初的嘗試是 *Becky Sharp*, *Richard Savage*, *Ibsen's Ghost*。這三齣戲都得

到了舞台的排演。（這是何等的幸運！）「莎菲琪」是根據一個十八世紀詩人的傳記做的，有他的好朋友漢烈（W.E. Henley）給做了一篇詩體的楔子。一八九一年四月十六日那天，在倫敦Criterion劇院裏，巴利第一次受觀衆的贊賞。「貝姬夏卜」是根據莎克雷的小說做的，比較幼稚；但是也在Terry's劇院演了。「伊卜生的鬼」是在Toole's劇院演的，雖是個只演半點鐘的獨幕劇，却得到很大的成功。年方而立的巴利，在劇場裏，已經同伊卜生王爾德諸老前輩開始抗衡了。

小說家改行做戲劇家，巴利並不是惟一的人。與他同國同時的就有蕭伯訥，高斯倭綏，歐文，卡納特，鄧生尼。小說叫他鍊成精美的文體，隨時都可以應用。

利用以往的著作，抓住一二無關宏旨之點，重新發揮一番，叫他另成一部大的著作：這個本領最大的，就是巴利。Walker, London 的根

據，不過是他「未婚時」裏的一件小事，再參加一點「莎菲琪」裏的材料，擴而充之，居然成了他第一個三幕長劇。這篇喜劇演了三百次，叫人笑斷了三百回腸子。

「福爾摩斯偵探案」的作者柯南道爾同巴利合編了一個「新鮮別緻獨出心裁的滑稽歌劇」，Jane Annie。他們真胆大，敢在 Savoy 劇院演歌劇，想和 Gilbert-Sullivan 見高低，焉有不失敗之理。

此時巴利是三十四歲了。Sir George Douglas 在一本雜誌裏描寫他的形容說：『用肉眼去看，巴利先生沒有什麼，簡直不像一個真正蘇格蘭佬。額高，帶灰色，頭髮和眼珠是黑的，側相遒勁，不像北方人，倒像意大利人。我看他的相貌很有幾分像愛倫蒲 (Allan Poe)。表情是羞澀，退縮。舉動之間，微露他著作裏所有的矯揉造作。北方人的性情，只能在打問訊之頃，稍帶粗魯的地方，推見一二罷了。』

古今的藝術家，無論大小，總有這麼一天，忽然得到頓悟，自己明白了，以前的作品都是預備時期未成熟的東西，真正的成功，現在才上正道。巴利也不是例外。他十年來的作品，從前自己以為了不得的，如今都覺得不滿意了。好在得到訓練之後，從此便確有把握。

藝術家的難關，就是怎樣才可以打破他所處的環境。巴利久已看得真真切切，他的藝術的目的，只是把人生當作他所見到的人生看待；別人的主張，不管是藝術家的或是批評家的，都一概置之不理。說起來也是笑話，藝術家的成功秘訣，是再簡單沒有的了：就只要對自身忠實，對自己的見解忠實，成敗利害，一概不顧。衆濁獨清，衆醉獨醒，巴利雖贏得最後的勝利，他精神上所受的痛苦，我們是不難測知的。

巴利成熟時期的第一個作品，便是 *The Professor's Love Story* 那篇

三幕劇。把幻象和諷刺鎔成一爐，這是初次試驗，不過它還只能算是一種情感的發洩，未到精純的地步。所以威廉·阿琪（William Archer）大肆攻擊，說它是劣等作品。然而，倫敦的觀眾非常歡迎，竟從一八九四年六月，演到翌年年底；在美國的成功，也出乎預料。

前世紀末葉，把小說改編作舞台劇本，很風行一時。巴利也受了傳染。他說，咱們要麼不幹改編這玩意兒，要幹得好好的幹，幹得像個樣兒。於是乎「小牧師」搖身一變，從小說便變成了劇本。蕭伯納對它成功的預言，不曾應驗，公演的次數並不算多。可是這與小說本差不多完全不同，簡直好得百倍，以致美力的斯請他改編 Evan Harrington。

此時巴利和尼可爾結伴，同遊美國。在新大陸上他對於我們最重要的工作，便是同 Charles Scribner's Sons 訂了契約，凡是他自己願意傳世的著作，都交給這家公司出版。這件事也許是因為美國人最愛讀他的

著作的原故。有一次他在火車上，來了一個「有眼不識泰山」的賣書報的小孩子，兜他買『巴利的新小說』，並且告訴他說，巴利最受歡迎，有人翻印。最受歡迎或許是一件罪過吧，無端惹起別人去犯翻印之罪！還有一件叫巴利滿意的事，便是他結識了弗洛曼（Charles Frohman）。這位導演家不但藝術精到，而且絕無「波希明」習氣，一言既出，永遠信守。所以巴利便托他導演自己的劇本，無論是在美洲或是在歐洲。

巴利戲劇界的朋友，不只弗洛曼一人，亞丹斯女士（Miss Maude Adams）那位名角，也是一個。爲她而寫的劇本有Shakespeare's Legacy。爲了同樣的理由，他替 Miss Pauline Chase 寫了 Pantolon，又替 Miss Hilda Trevelyan 寫了 Afterthought 的原稿。英國戲劇界的名人如 Alfred Wareing，也是巴利的知己。戲劇家和演員及導演者的關係，本來是萬分密切的。

在這個時期之中，巴利雖然結交了不少的朋友，但是失去了的朋友，也就不在少數。就中最令他痛心的，自然是他母親的死。可是，我們又不能不感謝她，因為爲了紀念她，我們才得着了 Margaret Ogilvy, Sentimental Tommy, A Lady's Shoe, Tommy and Grizel。

在他失而復得的朋友裏面，我們得注意威廉·阿琪。上文裏我們說過，阿琪是反對巴利的，但是，不到幾年，The Wedding Guest 出世以後，他居然大大的恭維。這種沒有成見的批評家，真值得我們崇拜。其實巴利是走上了鴻運了。你看，他一九〇二年連演了兩個今古傑作，震動了全世界，這還不算鴻運嗎？一個是 Quality Street，一個是我們現在不久就要領略的 The Admirable Crichton。一年以後，直到 Little Mary 又上台了，這兩齣戲還是天天滿座！

我們戲劇家的進步是不可限量的，又一年以後，「潘彼得」(Peter

Pan，原名The Great White Father）便於十二月二十七日在倫敦初次和老老少少的人們見面了。從此以後，直到如今，如果聖誕節不演「潘彼得」，那便算大大的憾事。

「潘彼得」的來歷，似乎可以藉此機會，說它一個大概。差不多三十年以前，有一位短鬚先生，閒來無事，又值天氣晴和，不免也到倫敦鏗辛墩公園走走。正在怡然自得之頃，忽見四個男孩子，規規矩矩的裝做一家人在草地上玩耍。他在一旁偷看，却不提防內中有一個大方的，不管他有沒有鬚子，只見着他為人倒很和氣，公然拉他加入。你我碰見了這種場合，大概也不會拒絕吧。於是乎小鬚子就加入了。他發明了許多驚險的玩意，直玩到夕陽西下，是回家吃茶點的時候為止。

原來這五個人不是別人，到了家門，彼此都吃一驚：那四個小孩兒是 Davies 夫婦的兒子，演員 Maurier 的頂首親戚，——那個小鬚子也不